

從徐國琦新著 *Strangers on the Western Front: Chinese Workers in the Great War* 談國際史的研究方法

吳翎君*

近二十年來，西方學界的傳統政治外交史研究已有窮途待變之勢。入江昭和韓德等著名學者的論著，即早已運用國際史和文化史的視野重新探討美國、遠東與中國的關係，為政治外交史研究注入新活力。柯偉林亦指出，民國時期對外關係的影響實已穿透中國社會各個層面，並提出要對國際化、內化和外化等因素進行通觀考察。如何更深入地分析中國的國際化問題，已成為一個亟待學者研發的重要課題。透過評介徐國琦的《西線的陌生人——一次大戰的華工》，本文分析此書如何以多國檔案探究一戰時期中國的國際史，並對一戰華工研究提出新的觀察，藉此說明這類以中國為主體進行國際史研究的方法與特色。

關鍵詞：國際史、中國與一次世界大戰、中國勞工

* 國立東華大學歷史系教授

一、前言

自 2005 年迄今，香港大學歷史系的徐國琦(Xu Guoqi)教授接連在劍橋大學出版社和哈佛大學出版社刊出三本專書。這一系列專書可視為作者撰述近代中國國際化歷程的三部曲，此三書訊如下：

1. *China and the Great War: China's Pursuit of a New National Identity and Internationalization*. Cambridge, UK and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5. (馬建標譯，《中國與大戰——尋求新的國家認同與國際化》，以下簡稱《中國與大戰》)

2. *Olympic Dreams: China and Sports, 1895-2008*.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8. (《奧林匹克之夢——中國與體育》，以下簡稱《奧林匹克之夢》)

3. *Strangers on the Western Front: Chinese Workers in the Great War*.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1. (《西線的陌生人——一次大戰的華工》，以下簡稱《西線的陌生人》)

三部專書的共通特色，係以「中國中心」(China-centered)來探究中國國際化(internationalization)的軌跡，將中國與一次大戰、中國參與近代國際體育活動、華工與一次大戰等三大主題，通過多國檔案的比較，並融入全球視野，從而將近代中國納入全球史，既探索中國國際主義的興起，也說明中國人尋找新國家認同的歷史進程。整體來看，作者將中國對外關係的老議題，置於中國化(internalization，或譯內化)和國際化的雙重脈絡中，爬梳更多元的原始史料深入探究，進而提出頗具原創性的研究成果。

作者的第一本專書《中國與大戰》，修改自其哈佛大學歷史系博士論文(1999)；當時其指導教授即為著名學者入江昭(Akira Iriye)。本書自

2005 年出版後，由於運用中、美、英、法、德等多國檔案，且因觀點新穎，甫問世即受到學界矚目。《奧林匹克之夢》則探討基督教青年會天津分會引進現代奧運活動的百餘年來，中國如何利用西方體育來改善中國的命運、重塑國家認同，及提高國際地位(包括 1949 年以後台海兩岸在奧運代表權之爭、1958 年北京在反對「兩個中國」的政策下退出國際奧運，以及 1979 年重返奧運後，如何利用體育向西方展示一個開放的新中國，力圖用奧運金牌數目證明中國是強國)。作者分析北京如何操縱體育活動成為國際政治的一個重要砝碼，及近代中國從帝國主義所恥笑的「東亞病夫」，到崇拜奧運金牌的「強國」情結。作者指出：2008 年北京雖獲得奧運主辦權，但中國人是否真的即已「站了起來」？對於中國如何找回民族自信和建立國家認同，作者均提出強烈省思與批判。

在《中國與大戰》第 4 章，作者即已著重探討了一戰時期華工對歐戰的貢獻，而《西線的陌生人》則延續此一主題，蒐集散落世界的各種材料，從個人書信、日記、基督教青年會(YMCA)報告，以及包括中國、英國、法國、加拿大、美國等各地的官方檔案，補綴出華工參與一次大戰的傳奇故事。

從資料蒐集而論，《西線的陌生人》可說是踩著一群遠赴「歐洲的奧德賽」(European Odyssey)華工之足跡，遍訪與華工相關的歐美各國官方和私人圖書館。作者甚至還蒐羅華工後裔提供的資料，種種在徵集史料上的勤勉，使此書挖掘資料之豐富堪稱令人驚艷。特別是首次披露過去加拿大政府刻意封鎖的加拿大華工資料，以及大量引用英國里茲大學(University of Leeds)關於華工營外籍軍官的書信和照片，更讓本書展現細膩生動的華工生活史面貌。要之，作者在枝葉繁蔓的多元檔案中爬梳出富有意義的精彩故事，並賦予新的詮釋，這不僅顯示作者綜合史料的高超分析能力，也具體展現了國際史研究能予讀

者的深刻啟發。¹

《西線的陌生人》以社會底層的農民或邊緣人(Marginal Man)透視中國，以這些歷史人物作為連結東西文明的信使，將華工個人或群體生命導入到族群、國家和國際的複雜互動，進而賦予歷史更多深度與意義。本文評析徐國琦如何運用多國檔案和國際史視角探索一戰時期的華工問題，藉以說明以中國為主體的國際史研究在方法論上的重要特色。

二、國際史的研究趨勢

近二十年來傳統政治外交史的研究，在西方學界幾已宣告窮途末路。1971年長期任教哈佛大學的梅野(Ernest R. May, 1928-2009)，就提出「外交史的衰落」(The Decline of Diplomatic History)，呼籲外交史同行要擴大研究的視野，否則該領域有「頻臨消失」的危機。²美國外交史學界對於外交史研究的何去何從，近年來歷經不斷的辯論和反思，最大的變革關鍵便是跳出傳統外交史的框架，改變美國外交史為國際史(The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History)，打破以美國為軸心的研究方法。一些外交史學家同時也意識到傳統政治外交史過度重視政府角色、軍事和外交談判，忽略文化、經濟、科技、媒介、信息等重要因素。

1992年韓德(H. Michael Hunt)在《外交史》(Diplomatic History)發表〈美國外交史的長期危機——正趨向終結〉(Long Crisis in U. S. Diplomatic History: Coming to Closure)一文，對該領域進行全面檢討。韓德將美國外交史領域分為三派，一是「現實派外交史學」，這批學者重視於美國本身的

¹ 徐國琦曾自述其如何運用各國圖書館和檔案館的經歷，詳見氏著，〈浮生三記〉，頁365-382。

² Ernest R. May, "The Decline of Diplomatic History," pp. 339-430.

外交政策，重視「國家利益」、「地緣政治」、「國際現實」等概念。二是所謂進步外交史家(Progressive Diplomatic History)，此派的特點是結合外交與內政，分析經濟體制、社會結構、文化媒介等因素對美國內外關係的影響。第三，國際學派，著重分析國際大環境對美國外交決策的影響，此一學派大師雲集，在美國具相當大的學術影響力。韓特認為這三個學派各有建樹，但在方法、概念和內涵上亦有不少缺陷。但他仍對此一學科持有樂觀的謹慎，認為由於該學科學者不斷調整該學科的方向，特別是愈來愈走向多元化和國際關係史的模式，長期存在的學科危機「正趨向終結」。³

在入江昭、韓德等學者的倡導下，國際史這一名稱在美國學界已得到相當程度的認同。入江昭在 1989 年美國歷史學會主席就職演說時指出，國際史是一種全方位的歷史研究法，它超越了傳統外交史一味強調政府之間的交涉、談判等限制，把文化、社會思潮變遷、個人情感等複雜因素引入考察之列。國際史與傳統政治史的主要區別在於它超越國界，側重多層次對話，並以整個國際體系作為參照系，強調國家間的政治、文化等多重交流、對話及互動。入江昭近來的論著亦環繞著全球化之間的多層次交往關係，例如以全球化觀點探討近代以來中日兩國在權力、文化和經濟上的互動和消長，或是後冷戰時代的來臨，世界由兩極走向多極，在全球化趨勢下文化

³ H. Michael Hunt, "Long Crisis in U. S. Diplomatic History: Coming to Closure," pp. 115-140. 有別於傳統政治外交史的角度，韓德早於 1980 年左右即從經濟活動與外交關係的視野，探討 1890 年代來美商在中國市場的發展。Michael H. Hunt, "American in the China Market: Economic Opportunities and Economic Nationalism, 1890s-1931," pp. 277-307. 關於韓德的研究，參見吳翎君，〈評 Michael H. Hunt 著，*The Genesis of Chinese Communist Foreign Policy*〉，頁 209-218。

交流、市民社會、經濟共同體的相繼出現，以及政府角色的相對減弱。⁴ 1991年，韓德在出任外交史家協會主席的演說中，亦以〈美國外交史的國際化〉(Internationalizing of U. S. Diplomatic History)為題，闡述國際史研究的必然趨勢。⁵ 1990年代後期，韓德轉向關注當代美國國際史和全球史研究，例如著名的《美國的崛起——美國如何成為世界霸主》(*The American Ascendancy: How the United States Gained and Wielded Global Dominance*)一書，即從全球化的脈絡宏觀百餘年來美國經濟、文化的發展，論析美國霸權的形成及其結果。

入江昭與韓德的國際史方法和視野，焦點仍為美國對外關係或遠東世界的多層面和國際取向研究。1997年哈佛大學中國史學者柯偉林(William C. Kirby)〈中國的國際化——民國時代的對外關係〉一文，將視野拉到中國作為主體的國際化議題，以國際化視野看待中國近現代歷史的發展，強調近代以來中國與世界之間的交互作用。柯偉林認為，柯文(Paul Cohen)側重中國內部面向(more interior approach)的研究雖對近代中國史研究有所貢獻，但絕不能忽略國際因素的面向，特別是在1912年和1949年兩個「新中國」階段，國際因素的影響無所不在。他逐一考察民國時期政治、軍事、文化、經濟、商業和教育等方面的國際化脈動，總結稱民國時期對外關係的影響徹底穿透於中國社會的各個層面，可說是「從國際發現中國歷史」。柯偉林提到，國家與政府對於二十世紀中外關係，不論就私人或公眾而言都至關重要；

4 Akira Iriye, "The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History," pp. 2-9; "Culture and Power: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s Intercultural Relations," p. 115; *China and Japan in the Global Setting; Global Community: The Role of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in the Making of the Contemporary World*.

5 Michael Hunt, "Internationalizing U.S. Diplomatic History: A Practical Agenda," pp. 1-11.

這種關係發生於跨越國界而不可避免的背景之下，且國家和政府對非政府個體的許多活動還進行調停、斡旋與監督。他指出「全球化」概念的預設，是世界上國家之間相互模式的不斷趨同，但它沒有考慮文化及政治的變化不如交通、通訊、貿易所產生的變化迅速，而「國際化」指的便是這種變化過程中彼此相互聯繫，又相互衝突的過程，因而有必要透過中國的國際化視野，看待民國以來的對外關係。柯偉林近年的著作一再強調中國對外與對內關係的交互作用過程，對近代中國的國際化、內化和外化(externalization)的大命題提出思考。⁶

從國際史或全球史的角度釐清個案研究，是近年西方學界的研究趨勢。雖然未來「國際史」的研究前景仍有待觀察。但不可否認的是，二十年來美國史學界試圖在傳統外交史研究中，一再嘗試新的研究方法和趨勢，為傳統政治外交史注入新的活力。

徐國琦在《中國與大戰》、《奧林匹克之夢》兩書中提出「中國化」和「國際化」兩個概念，論述近代中國對世界的參與。他認為國際化指的是近代中國積極參與國際體系，而國際化的過程亦促進中國與外部世界及國際體系的交互作用，中國化的推動力則來自中國與世界在社會、思想、經濟、意識形態與文化資源等層面的接觸與互動。因此，中國化是國際化的最後目標。徐國琦在新著《西線的陌生人》中更進一步闡述，認為從甲午戰敗後到一次大戰間，中國的政治與文化主要為雙重歷程所形塑，亦即激烈的中國化與國際化。「中國化」是中國在西方沖擊下的自我更新，並為國際化所準備的一個過程和狀態。國際化包括消極被動與主動的兩種形式，前者伴隨著外

⁶ William C. Kirby, "The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China: Foreign Relations at Home and Abroad in the Republican Era," pp. 433-458. 這篇文章的延伸研究便是"China's Internationalization in the Early People's Republic: Dreams of a Socialist World," pp. 870-890.

國的侵略中國所帶來政治、經濟和文化上的影響，而後者(中國人)自身採取的積極國際化作為，包括擁抱西學、政治理論與外國政治模本，及積極提昇中國在國際舞台的地位。(頁 12)從這一角度而言，一次大戰正是首次的全球性事件，使近代中國知識菁英產生無限的想像，他們感覺到中國的積弱和混沌，需有一強大的動力來改變它。

《西線的陌生人》的研究脈絡和作者的前兩本書大抵遵循這樣的學術關懷，亦即從近代中國的國際化脈絡出發，以具體個案探尋中國與世界的互動關聯，並追尋新的國家認同。

徐國琦的研究基本上處於歐美學界的中國史研究脈絡之中，而較為不同的是，徐國琦以「中國化」、「國際化」兩個脈絡處理近代中國對世界的參與過程，其最終關懷仍回歸於中國的主體性，與中國自我追尋的歷程。而徐國琦運用的研究方法和視野，又與東方學者探索中國對外關係的主體性明顯不同。

臺海兩岸近年已逐漸脫離以收回國權之過程為主線的民國外交史研究，例如強調中國積極主動參與國際社會，通過國際會議的談判和國際組織的合作，提昇中國的國際形象和地位；而以國共兩黨觀點為主線的政治外交史研究成果亦為數不少。此外，兩岸及日本學界近年亦有提出全球化視野下的外交史研究。整體而言，東方學者論述全球化下的外交史，仍偏重政治層面的外交研究。⁷

徐國琦的研究含有一些與兩岸學界和日本學界的不同之處，和

⁷ 關於民初外交史研究的回顧，可參見唐啟華，《被「廢除不平等條約」遮蔽的北洋修約史(1912-1928)》，頁 10-14。大陸學界新近關於國共政爭與中國政治外交的研究，可參見王建朗，《太平洋戰爭爆發後國民政府外交戰略與對外政策》、汪朝光，《國共政爭與中國命運，1945-1949》。關於臺海兩岸及日本學界近年對外交史研究的省思，參見唐啟華，《全球化下外交史研究的省思》，頁 201-217、川島真，《中國近代外交の形成》。

值得參考的研究方向：第一點為入江昭等人主張的「全面性的國際關係史」脈絡，國際史所兼顧的層面不僅是政治外交，而是更廣闊而全面的全球歷史。第二點為柯偉林等提出的「中國的國際化」脈絡，從中國內部及其本身，探尋與國際世界關聯的意義。第三點為徹底的多檔案主義，運用跨越單一國家或單一層面的檔案。第四點為中國與國際社會的對話，即中國在參加以西方觀點為主的國際秩序時，接受新參加國的國際社會也隨之變化，而中國亦在此對話過程中尋找屬於自己的國家認同。就第四點而言，徐國琦的三部曲著作中，《奧林匹克之夢》以國際組織的個案切入，應是較佳的範例。他探討中國參與奧會對台海兩岸外交、國際體壇、國際社會的影響，和長期以西方模式思考的世界所造成的衝擊；又指出近百年來中國人追尋奧運金牌，卻是以西方為參照下的思維。中國在達成百年一夢之時，二十一世紀的中國應重新思考何者為中華民族的天命，找尋適合中國國情的新國家認同，中國才不會繼續走彎路。此一觀點對於二十一世紀中國與世界的意義尤大。

三、中國與第一次世界大戰

關於第一次世界大戰在世界史上的意義，西方學界著述繁多，但中國的地位和角色總是被忽略。就以晚近出版的二本專書，在學界評價甚高的弗格森(Niall Ferguson)《一戰之悲愴》(*The Pity of War*)和基根(John Keegan)《一戰新論》(*The First World War*)二書，對中國問題皆略而不詳。⁸ 此外，拉法基(Thomas E. LaFarge)出版於1937年的經典之作《中國與第一次大戰》(*China and the World War*)係以英美日等國的外交文件探討

⁸ Niall Ferguson, *The Pity of War*; John Keegan, *The First World War*.

一戰時期的中國的國際關係，認為中國領導者無能或不願參與國際事務。⁹戚世皓(Madeleine Chi)《中國外交，1914-1918》(China Diplomacy, 1914-1918)則運用中、日、英、美等國外交檔案，著重一戰期間日本與英、美在華勢力的競爭與利益衝突，並論述其成為 1919 年中國民族主義興起的背景。¹⁰

相較於前人著作，徐國琦《中國與大戰》最大的特點是，它從國際史的視野探討中國與一戰的關係：即從中國參戰目的、「以工代兵」的參戰政策、中國「外交政治群體」的形成，以及大戰對中國內政外交的長久影響，肯定中國政府藉宣戰廢除中國與德、奧間的不平等條約、中國躋身巴黎和會及參與國際新秩序等成就。儘管中國對巴黎和會的結果感到失望，卻因此對世界產生新的想像，並藉此探尋新的國家認同。過去以歐洲為中心的一戰史研究，也終於出現全方位視野下中國角色的新切入點。美國賓州大學(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日本史專家狄更遜(Frederick R. Dickinson)評論，該書雖不是第一本探討中國與大戰的英文書，但卻是唯一一本從一手多元檔案，探討中國參戰目的的學術著作。¹¹英國倫敦政經學院(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Political Science, LSE)著名資深教授尼許(Ian Nish)稱本書為「近幾十年來最徹底、全面探討此一主題的專著」，儘管書中某些觀點或有爭議，但本書以紮實的檔案為基礎，從具體例證分析過去較不為人知的中國方面的敘事，為「撰寫國際史的良好範例」(A fine example of the writing of international history)。¹²

⁹ Thomas E. LaFarge, *China and the World War*.

¹⁰ Madeleine Chi, *China Diplomacy, 1914-1918*.

¹¹ Frederick R. Dickinson, "review of *China and the Great War: China's Pursuit of a New National Identity and Internationalization*, by Xu Guoqi," pp. 1152-1153.

¹² Ian Nish, "review of *China and the Great War: China's Pursuit of a New*

中文著作歷來對歐戰議題大抵有以下幾個研究面向，但多為十餘年以前的研究成果，近年研究並不多見。首先是中國政府與內部派系對歐戰政策演變的探討。例如：歐戰爆發之初中國應維持中立政策與否？德國採行無限制潛艇作戰後，中國是否對德斷交？美國宣戰後，中國應跟隨美國參戰加入美國方面或協約國等方面。¹³歐戰期間美日在華的競爭極為緊張，參戰問題亦與國內親日(段派)與親美派發生關聯，不少中、日文著作對於寺內內閣的援段政策做出豐碩而紮實的成果。¹⁴晚近北京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王建朗的〈北京政府對參戰問題再考察〉一文指出，對於參戰案的探討，以往較多集中於府院之爭、派系之爭、南北之爭，因而對參戰一事頗多貶斥。該文論析中國應付歐戰策略、參戰構想在政策層面上的論爭，及為實現參戰利益而與協約國展開的先期交涉，闡述參加歐戰在近代中國外交戰略演變上所具有的積極及開創性意義。¹⁵

其次是歐戰爆發後中國朝野的反應。國內持反戰論者以孫中山最為積極，擔心段祺瑞內閣行參戰借款之實；言論界驕子梁啟超則力主參戰，建議北京政府應效法薩丁尼亞王國的加富爾，為統一意大利而參加克里米亞戰爭，藉以提高國際地位。在這方面，前人研究已經相當充分。¹⁶

第三為歐戰對於中國新文化思潮的衝擊。這方面相關著述可謂汗

National Identity and Internationalization, by Xu Guoqi,” pp. 722-723.

¹³ 張永木，〈德國無限制潛艇政策與中國參加歐戰之經緯〉，頁 153-201。

吳翎君，〈《美國與中國政治(1917-1928)——以南北分裂政局為中心的探討》〉，頁 13-26。

¹⁴ 林明德，〈簡論日本寺內內閣對華政策〉，頁 524-525；白井勝美，〈日本と中國〉，頁 103-136。

¹⁵ 王建朗，〈北京政府對參戰問題再考察〉，頁 1-30。

¹⁶ 諸如黃嘉謨，〈中國對歐戰的初步反應〉，頁 261-277。

牛充棟，如周策縱《五四運動史》即為經典代表之一。此外，專門針對一次大戰對中國知識份子精神層面的探討，則有黃金麟〈歷史的儀式戲劇——「歐戰」在中國〉一文。該文主要分析《東方雜誌》的歐戰報導，探討歐戰情勢演變之下，代表德先生與賽先生的西方文明面臨崩解，這場「沒有砲聲的戰爭」如何使中國在未出兵參戰的情況下，經驗這場大戰的層層教訓；並使進行中的文化改革運動在「歐戰」侵蝕下失卻其權威與憑藉，備嘗內外交迫之困窘。¹⁷羅志田〈六個月樂觀的幻滅——五四前夕的士人心態與政治〉，探討一戰結束後中國人對於「戰勝」狂喜到對巴黎和會的失望心態。中國雖號稱參戰，其實只派出一批勞工，卻因此而成為戰勝國，頗有喜從天降的感覺。然而，美國總統威爾遜(Woodrow Wilson, 1856-1924)的「背叛」(未能在和會中替中國主持公義)，結束美國在華前所未有的美好時光，也象徵國際社會對中國的拒絕。¹⁸

第四點為整體外交評價。過去對於中國與歐戰關係的中文研究雖多有創見，但大多以消極評價作總結。由於一戰發生的時間正值袁世凱政權到北洋政府時期，過去國共兩黨長期以來對北洋外交持否定批判的態度，以致我們對中國與大戰的印象停留在「巴黎和會的出賣」、「北洋賣國外交」，反而忽略而中國政府在大戰時期的積極外交表現。唐啟華的研究從近百年中國參與國際世界的脈絡出發，強調過去在革命史觀的宣傳下，北洋政府的外交表現長期被「賣國」的負面形象所遮蔽。其著作透過修約交涉的具體例證，重新評價北洋政

¹⁷ 黃金麟，〈歷史的儀式戲劇——「歐戰」在中國〉，頁 91-129。

¹⁸ 羅志田，〈六個月樂觀的幻滅——五四前夕的士人心態與政治〉，頁 105-124。羅志田，〈從國際發現中國歷史〉，頁 148-151 對於大戰爆發之初中國對國際社會的參與意識是否有那樣強烈有所保留，認為中國是在「戰勝」之後，才分享了中國與世界的距離。

府如何擺脫條約束縛、恢復中國主權完整及國際地位平等的積極作為。¹⁹唐啟華的專書緒章亦述及日本學者坂野正高等人對一戰後北京政府收回國權運動的研究成果。(頁12)在1970年代前，日本學界普遍認為北洋時期的軍閥政治在外交上無所建樹；及至晚近，始有中壯輩學者川島真等人對北洋時期中國外交的「近代化」予以肯定。²⁰

中國的一戰外交和國際化努力，是中國史乃至國際史的重大事件。誠如徐國琦所言，此時中國內憂外患集於一身，內政外交密不可分，要理解一戰對中國的意義，必須打破藩籬，從內政、外交、社會與國際關係逐一考察。那麼，從國際史方法探討14萬華工的動員究竟有何意義？本書首先即點出作為國際史一環的一戰華工史的重要性。英法徵集華工的過程，與英法在非洲、印度和越南等殖民地招募勞工有根本上的不同。中國雖非殖民地國家，而華工的動員數目卻最為龐大。過去對華工的研究僅止於中、英、法三方面，本書找到美、加兩國罕見的文件，說明1917年美國參戰後，隨即向法國借調一萬名華工，寫下一戰時期中美兩國人民同在異域合作的經驗；而華工於1917年至1920年間借道加拿大遠赴歐洲及返回中國的悲慘過程，更長期被加拿大政府刻意隱瞞。

一戰華工的角色長期不受西方重視，《一次大戰研究》(*Researching World War I*)這本厚達500頁的工具書竟只提到一次華工，即為其例。²¹不惟學術界不重視，事實上整個西方世界對一戰華工的集體記憶也正逐漸消逝。由於動用華工有違協約國家的立場(中國最初為中立國家)，

¹⁹ 唐啟華，《被「廢除不平等條約」遮蔽的北洋修約史(1912-1928)》。

²⁰ 坂野正高，〈第一次世界大戰から五三〇まで——國權運動史覺書〉，頁1-67；川島真，《中國近代外交の形成》。

²¹ Robin D. S. Higham and Dennis E. Showalter, *Researching World War I: a Handbook*.

涉及歐戰華工招募的英、法等國一開始就不願對外公開此事，且向中國求援畢竟有損英法兩個殖民帝國的形象。另一方面，中國政府亦封鎖華工訊息，因中國直到 1917 年才參戰，不願德國獲悉中國與英法間的「以工代兵」策略。而這批華工多為文盲，其留下的資料又相當有限。法國政府在 1980-1990 年代，於靠近中國城附近的小公園內建造一戰華工紀念碑，這也是世界僅有的一座。有感於重建一戰華工歷史的迫切感，正是作者撰寫本書的主要動力。²²

四、以中國為中心的國際史書寫

本書從史料實證出發，書寫方法嚴謹而有新意。國際史大家入江昭在封底寫下「本書奠定作者躋身近代史和國際史研究的頂尖學者之列」，對愛徒的新著作作出評價。耶魯大學教授溫特(Jay M. Winter)則稱譽本書「從一戰的全球史寫下不為人知且令人信服的篇章」。²³如前所述，國際史為近年的研究趨勢，但鮮少有具體研究能以中國為中心貫穿國際動脈，因而有必要詳加介紹本書如何以國際史方法，掌握多層次的國際政治、軍事外交、社會文化、個人情感和國家認同的書寫。本書內文共有十章，現簡介內容如下。

²² 徐國琦曾以中文和法文出版《文明的交融——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的在法華工》一書，該書為一般讀者而寫，圖文並茂；且不論章節架構與內容，均較 2011 年 2 月出版的英文新著簡略許多。此外，2008 年山東威海曾召開一戰華工會議，並由電視台拍攝紀錄片。詳見張建國主編，《中國勞工與第一次世界大戰》。

²³ Jay M. Winter 以專研一次大戰史享譽學界，著有 *The Great War and the British People*; *The Experience of World War I*; *Sites of Memory, Sites of Mourning: the Great War in European Cultural History*, 及新近的 *Remembering war: The Great War Between History and Memory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等十餘種專書。

第1章〈大戰和大危機——中、英、法與「以工代兵」策略〉首先探討1914年「8月槍聲」(Guns of August)爆發後中國對參戰問題的態度，以及梁士詒「以工代兵」政策的出台，使中國既可收參戰之好處，又可免於被德國譴責有違中立。在法國方面，大戰初期法國士兵大量傷亡，在此情勢之下，法國退休中校陶履德(Georges Truphil)遂與惠民公司正式簽約，執行招募華工的任務，史稱「陶履德招工團」(Truphil Mission)。在英國方面，當梁士詒提出「以工代兵」方案時，最早的目標為英國，但英國擔心此一作法將使中國由中立狀態走向協約國家陣營，因而遭到拒絕。作者同時分析英國人何以最初不願雇用華工的潛在理由之一，是由於大英帝國歷史光環的驕傲心態作祟，以及對有色種族的歧視。再者，和法國人一樣，英國勞工團體擔心華工對其勞力市場產生影響。此外，英國人對於中國參戰的意向不明。以上種種疑慮，使得英國最早表態拒絕華工招募之議。直到1916年夏天，特別是經過令英軍損失慘重的索姆河(Somme)戰役，歐洲戰場上的人力資源幾近崩潰，使得英國人不得不改變策略。

英國最初認為招募華工的首選之處為殖民地香港，但據朱爾典評估，北方人不論就氣候、飲食、紀律和對瘧疾的免疫力都比南方人適合，最後英國軍方同意自行招募威海衛的勞工。中國政府方面，由於赴歐華工人數愈來愈多，北京政府頒布相關法令保護華工在法國的權益，國會也要求設立僑工事務局自行監督，由張弧擔任首任主席。作者認為，中國政府對於華工在法國生活並非不加聞問，各種跡象反而顯示中國政府努力保護赴歐華工的各項權益。(頁36)

第2章為〈徵兵與「歐洲奧德賽」——為英法效命之人〉，作者借用希臘荷馬史詩〈奧德賽〉來比喻赴歐華工，因為他們即將航向未知的海洋，參與一場改變世界的大戰。本章探討華工的身分和來源、被篩選的條件、合同內容與待遇。

惠民公司與法國陶履德中校所簽訂的華工合約，屬於非技術性勞工的五年合約，僅從事防禦工程，不得用於軍事作戰。華工的權益和法國公民一樣，享有宗教自由，有固定假日，如患疾病亦可受醫療照顧。作者提到法國所簽的合約非常仔細，甚至包括食物和米飯量的需求。相較於此，英國則採自行招募華工，在待遇上亦有不同：例如華工在英國營工作一天可得 1 法郎，雖較法國為少，但他們在中國的家屬可獲得一個月 10 銀元的津貼。對於華工一旦受傷殘廢，該有怎樣的賠償，中國政府曾介入多次交涉；英國戰爭部終於 1918 年同意補償措施，由此更加證明中國政府對華工處境並非毫不關心。作者亦探討英、法兩國在招募華工問題上的競爭和磨擦。最後並分析這批被挑選上的華工的條件：大多六呎高，身強力壯，篩選過程包括身體健康檢查，有無患砂眼和蛀牙等項目。究竟有多少華工被送到法國境內？作者比對各項記錄，甚至亦參考中國北方各口岸載運出的華工人數與出航日期，而得出約 14 萬名的華工。這些華工主要為文盲、質樸善良的鄉下農民，但當然亦有少數品德不佳者。

第 3 章為〈被隱藏的歷史——秘密的加拿大通路〉。英國所招募的華工大多經由加拿大通往法國，大戰結束時亦由同一路徑遣返。自 1917 年 3 月至次年 3 月，共有 84,244 名華工經加拿大抵達法國。這批華工究竟是如何運送，過去未有討論。作者分析，在德國採行無限制潛艇作戰後，英國當下決定繞道加拿大，主要由加拿大軍方負責將華工運送至法國，加拿大太平洋鐵路公司(Canadian Pacific Railway Company)則承攬穿越洲境的路段。

本章運用當時隨著華工從威海衛一路到法國的加拿大軍醫李維斯頓(Harry Livingstone)的見證，記載華工在威海衛登上「俄國皇后號」(Empress of Russia)後的航行。作者以其敘事筆法描寫這批華工的海上旅程，並探討其運送過程中相關的安全措施。例如：加拿大輪船公司

要求，載運苦力船隻不需要有救生設施，並修改安全法。由於戰時救生設備不足，英國軍方為盡快運送華工苦力，竟然率爾同意；而戰後英國為促使華工儘速遣返中國，竟亦贊成加拿大政府放棄安全法。作者深入描述華工在加拿大期間生活受到嚴重管制的情形，因華工有時無法馬上登船赴歐，加拿大移民部門雖同意借道華工不需繳納針對中國人的 500 元人頭稅，但條件即是華工不得離開火車，或限制自由行動。這批華工在加拿大的行蹤如何保密，對加拿大政府來說是個難題。因受戰爭處置法(*War Measures Act*)的約束，加拿大政府實施新聞檢查制度，作者根據任務負責人錢柏(Ernest Chamber)上校的文件，探討加國政府如何刻意壓制華工消息。本章最後探討加拿大人對待華工的惡劣態度，尤其在運往法國的航程中特加苛刻。例如一個車廂共有 4 名加拿大衛兵看管，亦動員 19 名軍官和 600 名士兵組成特別衛隊，其目的僅在於防止華工逃跑。穿越加拿大的 4,000 哩行程，實為赴歐華工最黑暗的一段旅程。

第 4 章〈工作〉主要探討歐洲華工營的工作環境、管理、工作內容、華工的犧牲和戰後命運。華工雖不具備軍人身份，但根據第一位出任英國華工營的軍官費爾費克斯(B. C. Fairfax)的資料顯示，華工營其實採取軍事化管理，倘若華工違返命令，得受軍事法庭審訊，且華工的信件亦受到檢查，值勤時也需穿著制服。由於戰時人力不足，華工營的軍官或譯員匱乏，導致管理上溝通不良的情況相當普遍。儘管華工合約中明載不得派赴危險區，但有時亦無法避免，不少華工因此死於戰爭轟炸。

一般而言，英國的個案顯示大多數的華工被派往前線，而法國招募的華工則是派往私人工廠，多數遠離前線。然而，在 1917 年中國宣佈參戰後，法國華工營也明目張膽地將華工派往軍事區，負責爆破、修復機器、建築公路、維修工事等任務。作者根據多方資料

引述，證明華工的工事技術和手工技巧贏得不少讚譽，表現勝於印度人和埃及人許多，基督教青年會的資深人員也對華工不怕死的英勇表現嘖嘖稱奇。作者在文中提到幾件可歌可泣的華工英勇事蹟，最後探討歐戰結束後，儘管英國政府承認華工在有色人種的工人中最為冒險，但事實上華工僅獲頒幾枚光榮勳章。英國政府不僅有意削減死傷華工的養老津貼，在巴黎和會時，英國外交部長巴爾福(Arthur Balfour)更離譜地公開否認華工在戰時的貢獻。戰爭末期還有一份報告聲稱華工帶來 1918 年歐洲的「西班牙流感」(Spanish Flu)。作者感歎，協約國家不僅未對華工表示感謝，戰後馬上翻臉否定華工的貢獻，甚至說華工帶來地方上的騷擾，只希望盡快遣送華工回國。

第 5 章〈待遇與認知〉探討華工營內的種族問題。本章首先提到英國人對待非洲勞工採取的種族隔離政策，即使中國並非英國殖民地，英國人對中國人的歧視和優越的態度，其實和對待非洲人相差無幾。有些英國人甚至以為華工幫助協約國，等於英國人成了華工的「新主人」。再者，嚴重缺乏翻譯官也造成溝通不良。作者以生動的例子說明這些瑣細的問題，例如當英國軍官將重音擺在 *Let's go* 的 *go*，華工誤以為被罵為「賴死狗」。作者引用英國的私人信件，說明他們對華工的誤解和懲罰，而受到不公對待的華工有時會以罷工作為抗議，亦有少數採取自殺的激烈手段，如 1917 年間發生的英國華工營暴動事件。作者同時比較英國和法國對待華工的不同態度，法國人對待中國人較無種族歧視，使得中國人受到較好的待遇。當時中國政府外交人員李駿盡力替法國營的華工爭取權益，對法國營華工待遇的改善也曾發揮作用。在紀律和管理方面，法國人較少有種族主義，採取家父長式管理方式，比起英國的管理相對民主。

本章最後提及大戰結束後華工的處境和遣返。英國迫不急待地想把華工遣送回國，1918 年 11 月 1 日，首批送回的竟是身染重疾的

365 名華工，到 1919 年 3 月，所有華工病患既已全部遣送完畢。然因不堪長途航行，有 26 人死於途中，另有 2 人跳海自殺。作者總結英國對待華工的方式，與其說是華工引起的問題，不如說是顯現英國人對中國的無知、對於持續作戰的沮喪，以及對自身社會的失望。

第 6 章為〈陌生世界的陌生客——華工在歐洲的生活〉，探討華工在歐洲的生活面貌，及西方人對他們的觀感。沿途護送華工到法國的孔麥克(George E. Cormack)稱中國人為「好夥計」，稱讚這群來自鄉下的華工自律、富人生哲理、具幽默感、大方和孝順父母。華工抵達法國後，他們的服飾、外貌和舉止，都引起西方人的好奇。華工喜愛光著上半身、戴大草帽、不畏寒冷，總是帶著淺淺的微笑；也有人描述華工舉止不雅，骯髒齷齪。同樣地，華工也對陌生的文化驚訝不已，由於中西文化差異和語言隔閡，導致不少生活上的誤解。作者蒐集華工所作的歌曲，詞中描繪著這批華工的思鄉心情，對未來的渴盼、歡樂與愁苦，亦詳述華工營的娛樂和運動，包括踢紙球、打牌、打拳、拼圖、打乒乓球等等。較為特別的是，不少華工也是創作戰壕藝術(trench art，利用空彈殼和砲殼所做的裝飾藝術)的高手。本章最後探討這批華工的「娛樂、性和羅曼史」，提到英國華工營中較嚴重的問題應是賭博，而法國華工營則是嫖妓所導致的性病問題。文末介紹法國女人與華工的愛情故事，資料主要來自華工家屬提供。其中一位華工張長松與法國女人相戀而結婚，育有多子，相偕六十餘年，最具浪漫傳奇。

第 7 章〈美國士兵與華工〉探討 1917 年 4 月美國參戰後，美國大兵來到法國戰場，需要勞工協助工事，因而向法國請求支援，法國乃借給美國一萬名華工。作者根據官方資料，證實 1918 年 8 月 20 日法國曾提供 11,539 名華工，主要擔任挖掘戰壕和運送軍火裝備。(頁 154)由於美國備戰不足，士兵訓練和管理不夠充分，以致美國營的

華工管理發生不少衝突。作者同時強調，美國遠征軍中管理華工的軍官一般位階較低，較無作戰經驗，且指示不明確，加上語言不通，翻譯員不足等原因，都加深華工營的管理問題。最後，作者舉出一些故事，說明美國人和華工相處的問題。例如：美國士兵和華工打群架，美國人不願和華工共事，相對於法國營的福利(根據法方合約，工作滿三個月有額外獎金)，美國營卻無提供相對的優惠獎勵，也讓華工心生不滿，甚至發生 160 名華工逃離美國工廠的事件。儘管有上述的磨擦，但美國遠征軍的華工確為美國在法戰場做出甚大貢獻，當時一些軍官的報告也多次肯定華工的功勞。

第 8 章〈基督教青年會與華工〉探討基督教青年會參與一戰華工營的活動，及其對華工生活、語言、溝通、教育與文化水平的影響。一次大戰爆發後，基督教青年會主動和英法協約國家聯絡，希望進入華工營服務；最初英、法並不表示歡迎，甚至有所疑慮。但隨基督教青年會所到之處，華工紀律、溝通和情緒問題的改善，協約國家的態度才大有改觀。然而，14 萬華工卻祇有 109 位基督教青年會士服務，人力顯然不足。作者指出，這批基督教青年會成員主要可分為中國青年學生(曾在海外讀書，特別是留美學生)、宣教士以及教會牧師三類。(頁 184)作者特別提到，不僅基督教青年會的中國秘書處對華工營的運作和管理有正面助益，當時中國政府與民間機構也贊助不少經費，希望協助華工。作者蒐集基督教青年會的日課表，包括研讀聖經、寫字、娛樂和運動等等。(頁 188)基督教青年會進駐之後，華工營的各種體育和表演活動為之活躍，許多華工開始學習識字，其中以晏陽初的識字班成就最大，奠定後來他回國後開辦平民教育會的構想。

第 9 章〈學生與老師的角色互動〉探討歐戰時期中國社會精英在力圖改造華工的同時，華工的進步也明顯影響他們的價值觀，及其對國家前途的思考，使之深信中國可以更為強大。作者深入分析「勤工

儉學會」在法國的活動，並探討《華工雜誌》、《旅歐周刊》和影響力最大的《華工週報》。此外，作者又分析基督教青年會中國留學生的角色，包括桂直廷、蔣廷黻、晏陽初、史譯宣等人，這批人受到威爾遜主義的號召，希望戰後中國能在新世界中有一平等的機會。晏陽初「3C」救中國論(孔子、基督和苦力)的名言，即來自歐戰華工的激勵。歐戰華工經驗對這群知識份子的影響十分長遠，華工可謂這群知識份子的另一種老師。五四時期「勞工神聖」的標語響徹雲霄，通過歐戰華工的作用，也影響到五四時期的新文化運動。作者統計1919-1920年底，約有1,600位中國學生和學者留學法國，這批人回國後改寫了中國當代的歷史，包括周恩來、鄧小平和陳毅等人。

第10章〈文明交融〉主要探討戰後華工對於戰爭的記憶、對歐洲的世界觀、回國後的出路以及他們對這趟歐洲之旅的想法。作者首先提到，清理戰壕的腐屍往往是華工對戰場的夢魘，見證這場殺戮戰爭之後，也使不少華工對西方的觀感由樂土變成廢墟。但是，這批華工當然也看到歐洲科技文明的進步，進而改變他們的世界觀，在他們返國後，不免從歐洲的觀點重新看待中國。作者從華工的書信及生動的小故事說明華工的改變。對於戰後華工回國後的安排，作者探討戰後中國政府對於華工安置問題的重視，中國早於1917年即成立僑工事務局，設法保障華工的權益。中國政府、國會與知識菁英對即將返國的華工預備了一套安置計劃，頒佈《安置回國華工章程》，多數華工受惠於此，回國後得以從事水利和鐵路工程。

1919年，回國華工在上海組織固定的活動，並保護自己的權益；他們或與五四愛國工人運動多少亦有聯結，但也有部分華工成為街頭小販，甚至淪為盜匪。作者認為，歐戰華工的海外經驗無疑提升了他們的知識水準，但更重要的是增強了對國家的認同。某種意義而言，14萬華工是中國派往世界的信使(messengers)，不僅是華工本身

的歐洲學習，中國也因為歐戰華工的關係，更理解西方，更加參與國際事務。(頁 227)最後，作者以感性的文筆提到華工墓園的橫幅匾額「萬古流芳」，另一側落款則是「血灑歐西壯世運，魂歸祖國挽神州」，作為本書的結語。(頁 239，按：原書漢語拼音有誤)

五、關於一戰華工研究的新論點

對於一戰華工的研究，陳三井教授於 1986 年出版的《華工與歐戰》為開創性的研究。該書在二十餘年前研究資源有限，資料蒐集不易的情況下，運用近史所、國史館及法國政府各部會與里昂大學等機構的檔案，首度研究一戰時期法國境內的華工。該書認為：「這群默默無聞的華工冒死效命於西歐戰地，真正落得『功成而無聞，身死而名毀』，不唯相去『流芳萬古』甚遠，且不啻是血與淚交織而成之人間一大悲劇。」²⁴兩位學者同樣對一戰華工深有悲憫之情，但給予的歷史定位則是截然不同。徐著首先推崇陳三井教授對於一戰華工研究的開創之功，更對於一戰華工的犧牲，給予積極正面的評價。作者認為，一戰華工身死而猶榮，儘管華工個人境遇悲慘，惟其犧牲不僅對於協約國家，乃至於在中國早期努力推進至國際舞台中扮演極重要的角色。(頁 229)

徐國琦將一戰華工的地位推到「最偉大的世代」(greatest generation)成員之列，認為華工在一次大戰前後徹底改變中國方向。(頁 241)理由是戰時世界各國的勞工多來自殖民母國的徵召，但華工則不然。沒有任何一個國家的勞工徵召像華工一樣，與其國家的政策密切相關，並且深深影響著一國的發展。華工派遣的重要性意義甚大：其

²⁴ 陳三井，《華工與歐戰》，頁 190。

一，華工的派遣和中、英、法三國密切關聯；其二，在法國的華工，提供中國走向國際化途徑和中國在世界的角色。這是在一次大戰時各國徵召勞工時並未展現的特質。

本書依據各方資料考證，提出如下幾項新論點：

(一)數據問題

過去的研究有 32 萬、20 萬、17 萬等說法，莫衷一是。作者根據各種資料考證和加總計算，認為 14 萬人比較可信。作者統合陶履德招工團和其他機構招工團的相關數據，以及北京政府僑工事務局、英國國防部和法國方面的資料，估算出一戰約有 14 萬華工。至於華工的死亡原因大抵有三：第一、赴法途中死於無限制潛艇作戰。作者提出有 752 名華工死於德國攻擊，而中國官方的數字是 713 名，不論如何至少有七百名華工在抵法之前喪失性命。第二、戰爭期間死於戰場。究竟有多少華工喪身於歐戰場？英國作戰部和中國外交部的數據不一，而法國方面的資料亦不詳盡。作者保守推估至少有三千名華工死於歐戰場，其墳墓在法國、比利時等地仍依稀可見。(頁 100-101)第三、死於清理戰壕，地雷、引爆炸彈等因。作者估算戰爭結束時，華工因清理戰場和掩埋屍體，待在戰場的時間比作戰部隊還久。在大戰結束時約有 3,000 名華工仍留在法國境內，有不少人後來定居法國，其中 1,850 名的技術工人和金屬工廠簽訂合約；許多華工娶了法國女人，其中有兩位更在 1989 年獲得法國政府的表揚勳章。據作者估算，約有 3,000-4,000 人華工死於一戰，死亡率約在 2% 以上。²⁵以上相關數據係經作者通過各國資料比對，應較接近事實。

²⁵ 另參見徐國琦，〈一戰期間中國的「以工代兵」參戰研究〉，頁 53-62。

(二)一戰華工的起緣問題

過去普遍看法認為中國積弱，派遣華工只是順應列強要求，作者認為中國自甲午以來固然積貧積弱，但立意維新是社會進步的巨大潛流。在這背景下，充滿新世代思維的知識分子在新中國建立後，推動中國成為國際平等社會的一員。因此，中國主動採行的「以工代兵」策略具有劃時代的意義，藉由參與一戰向世界有力地展示中國參與國際事務的願望和能力。

(三)北京政府對華工問題的重視

作者從相關資料分析指出北京政府甚為重視華工事務，除了「以工代兵」計劃的縝密運作，尚有僑工事務局等專責機構，對於在法華工的照顧亦盡心盡力，甚且在戰後華工回國前即做好安置計劃。這些作為與一般認為北京政府忙於軍閥內戰，置華工生死於不顧有所不同。

(四)各國華工營的管理問題

過去對於歐戰華工營的研究主要在於英法兩國，幾乎未見有美國、加拿大兩國的資料。作者逐一探討和比較各國華工營的管理、待遇、醫療和生活等狀況。相較於法國人的家父長式管理，英國人對於華工的管理較有種族歧視，美國營中亦有管理不當的方式。華工繞境加拿大途中，加拿大政府對華工更有諸多不人道的作為，釀成不少悲劇。作者認為管理方式的不當，主要根源於文化、種族和

溝通的問題的巨大鴻溝所造成的誤解；英國人對待華工的不友善方式，顯現英國對於東方文化的無知、對於持續作戰的沮喪以及對自身社會的失望，也使英國人失去一個歷史的機會向中國人展示英國人的公道和正面形象。

六、結語

本書從國際史的角度切入，將一戰華工的問題推至中國參與國際社會，並從東西方文明交流的角度，深入挖掘這段長期為西方學界所忽視的歷史。作者指出，一戰後英法等協約國人力潰敗，中國勞工適時地對歐洲戰場提供人力資源。一戰期間協約國總士兵陣亡數為五百餘萬人，從數字而言，14 萬華工參與大戰的歷史，長期受到西方學界的忽視，並非無法理解；然而 14 萬華工所做的清理戰壕和防禦工事，則是無法估算的貢獻。耶魯大學歷史學家甘迺迪(Paul Kennedy)認為，美國對第一次世界大戰的主要貢獻，不在軍事上，美國的參戰並不能立即改變交戰雙方的軍事力量，美國的主要貢獻在於經濟方面，美國的參戰使協約國家在作戰時不必擔心「國內經濟會有破產之虞」。²⁶透過徐國琦對中國與一戰、一戰華工的研究，我們可以理解：或許一戰華工的參戰對於協約國在軍事上的最後勝利沒有直接的影響，但中國與一戰關係意義重大。展望即將到來的歐戰百年(2014)，作者的兩本書應已使得一次大戰的國際史有了中國人的座標。

一戰華工的「奧德賽之旅」不僅是軍事和政治的，更是東西文明的信使。作者詮釋出一戰華工罕為人知的傳奇故事，將華工地位抬高為「偉大世代」的一群，他們是中西文化、族群融合的媒介，並建

²⁶ Paul Kennedy, "The First World War and the Powers System," p. 24.

構了近代中國國族圖像的重要元素。作者的終極關懷則是「何為中國人？何為中國？」並期盼有朝一日，中國能建立獨立自信的國家民族認同，擺脫以西方為參照系的百年求索軌跡，重建國家認同新架構，樹立中國文明體系，以不卑不亢之姿與西方文明平等對話。²⁷

國際史做為研究新法，涵蓋跨國或多國的政治、軍事、外交、經濟、文化、物質、消費和情感等層面。但不論如何，國際史研究必須建立於多國檔案和多元材料，立論一旦脫離檔案，便無法站穩基礎。入江昭等人提倡的國際史方法，絕不依靠炫巧的理論包裝，而是以檔案實證為基礎，深入研究主題，並展現高屋見瓴的視野。徐國琦澈底運用多元檔案的特色已如前文所述，更重要的是他樹立了如何以中國為中心的國際史書寫方法，這在過去中西學界的研究中相當罕見，誠為其系列著作最大的貢獻。

(本文於 2011 年 3 月 13 日收稿；2011 年 8 月 21 日通過刊登)

*本文初稿經海洋大學應俊豪教授校閱，復蒙匿名審查人提出寶貴意見，使筆者得以依據相關意見進行修正，謹此致謝。

²⁷ 徐國琦，〈現代奧林匹克運動與中國的國際化〉，頁 88。

參考書目

- 川島真，《中國近代外交の形成》，名古屋：名古屋大學出版會，2004。
- 王建朗，〈北京政府對參戰問題再考察〉，收入金光耀、王建朗等主編，《北洋時期的中國外交》，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6，頁 1-30。
- 王建朗，《太平洋戰爭爆發後國民政府外交戰略與對外政策》，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2010。
- 臼井勝美，《日本と中國》，東京：原書房，1972。
- 吳翎君，〈評 Michael H. Hunt 著，*The Genesis of Chinese Communist Foreign Policy*〉，《國史館館刊》，復刊 24(臺北，1998.6)，頁 209-218。
- 吳翎君，《美國與中國政治(1917-1928)——以南北分裂政局為中心的探討》，臺北：東大圖書公司，1996。
- 坂野正高，〈第一次世界大戰から五三〇まで——國權運動史覺書〉，收入植田崛雄編，《現代中國を繞る世界の外交》，東京：板野書店，1951，頁 1-67。
- 王朝光，《國共政爭與中國命運，1945-1949》，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0。
- 周策縱，《五四運動史》，臺北：龍田出版社，1980。
- 林明德，〈簡論日本寺內內閣對華政策〉，收入中華文化復興委員會主編，《中國近代現代史論集》，第 23 編，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頁 521-558。
- 唐啟華，〈全球化下外交史研究的省思〉，《興大歷史學報》，15(臺中，2004.10)，頁 201-217。

- 唐啟華，《被「廢除不平等條約」遮蔽的北洋修約史(1912-1928)》，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0。
- 徐國琦，〈一戰期間中國的「以工代兵」參戰研究〉，《二十一世紀》，62(香港，2000.12)，頁 53-62。
- 徐國琦，〈浮生三記〉，收入王希、姚平編，《在美國發現歷史——留美歷史學人反思錄》，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0，頁 365-382。
- 徐國琦，〈現代奧林匹克運動與中國的國際化〉，《二十一世紀》，111(香港，2009.12)，頁 84-91。
- 徐國琦，《文明的交融——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的在法華工》，北京：五洲傳播出版社，2007。
- 張水木，〈德國無限制潛艇政策與中國參加歐戰之經緯〉，《史學集刊》，9(臺北，1977.4)，頁 153-201。
- 張建國主編，《中國勞工與第一次世界大戰》，濟南：山東大學出版社，2009。
- 陳三井，《華工與歐戰》，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86。
- 黃金麟，〈歷史的儀式戲劇——「歐戰」在中國〉，《新史學》，7：3(臺北，1997.9)，頁 91-129。
- 黃嘉謨，〈中國對歐戰的初步反應〉，收入中華文化復興運動委員會主編，《中國近代現代史論集》，第 23 編，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頁 261-277。
- 羅志田，〈六個月樂觀的幻滅——五四前夕的士人心態與政治〉，《歷史研究》(北京，2006：4)，頁 105-124。
- 羅志田，〈從國際發現中國歷史〉，《二十一世紀》，95(香港，2006.6)，頁 148-151。
- Chi, Madeleine. *China Diplomacy, 1914-1918*, Cambridge, Mass.: East

- Asian Research Center, Harvard University, 1970.
- Dickinson, Frederick R. "review of *China and the Great War: China's Pursuit of a New National Identity and Internationalization*, by Xu Guoqi,"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111:4(Oct. 2006), pp. 1152- 1153.
- Ferguson, Niall. *The Pity of War*, London: The Penguin Group, 1999.
- Higham, Robin D. S. and Showalter, Dennis E. *Researching World War I: a Handbook* , Westport, Conn: Greenwood Press, 2003 .
- Hunt, Michael. "American in the China Market: Economic Opportunities and Economic Nationalism, 1890s-1931," *Business History Review*, 51: 3 (Autumn 1977), pp. 277-307
- Hunt, Michael. "Internationalizing U.S. Diplomatic History: A Practical Agenda," *Diplomatic History*, No. 15 (Winter 1991) , pp. 1-11.
- Hunt, Michael. *The American Ascendancy: How the United States Gained and Wiielded Global Dominance*, UNC Press, 2007.
- Hunt,H. Michael. "Long Crisis in U. S. Diplomatic History: Coming to Closure", *Diplomatic History*, No. 16 (Winter 1992), pp. 115-140 .
- Iriye, Akira. "Culture and Power: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s Intercultural Relations", *Diplomatic History*, Vol. 3(Apr. 1979) , pp. 115-128.
- Iriye, Akira. "The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History, "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Vol. 94, No. 1(Feb. 1989) , pp. 1-10.
- Iriye, Akira. *China and Japan in the Global Setting*,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2 .
- Iriye, Akira. *Global Community: The Role of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in the Making of the Contemporary World*,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2
- Kirby, William C. "The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China: Foreign Relations at

- Home and Abroad in the Republican Era,” *China Quarterly*, 150 (June 1997), pp. 443-458.
- Kirby, William C. “China’s Internationalization in the Early People’s Republic: Dreams of a Socialist World,” *China Quarterly* (December 2006), pp. 870-890.
- Keegan, John. *The First World War*,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Inc. 1999.
- Kennedy, Paul. “The First World War and the International Powers System,” *International Security*, 9:1(Summer 1984), pp. 7-40.
- LaFarge, Thomas E. *China and the World War*,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37.
- May, Ernest R. “The Decline of Diplomatic History”, in Billias, George A. and Grob, Gerald N. eds. *American History: Retrospect and Prospect*, Free Press, New York: 1971, pp. 339-430.
- Nish, Ian. “review of *China and the Great War: China's Pursuit of a New National Identity and Internationalization*, by Xu Guoqi,” *The China Quarterly*, 183 (Sep. 2005), pp. 722-723.
- Winter, Jay M. *Remembering war: The Great War Between History and Memory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6.
- Winter, Jay M. *The Experience of World War I*, London: Macmillan, 1988.
- Winter, Jay M. *Sites of Memory, Sites of Mourning: the Great War in European Cultural Histor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5.
- Winter, Jay M. *The Great War and the British People*, London: Macmillan and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5.

- Xu, Guoqi. *China and the Great War: China's Pursuit of a New National Identity and Internationalization*. Cambridge, UK and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5.
- Xu, Guoqi. *Olympic Dreams: China and Sports, 1895-2008*.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8.
- Xu, Guoqi. *Strangers on the Western Front: Chinese Workers in the Great War*.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1.

**Xu Guoqi's International History Approach and
His New Work *Strangers on the Western Front:
Chinese Workers in the Great War***

Lin-chun Wu

Department of History, National Dong Hwa University

For the last twenty years, traditional diplomatic history in the West has suffered a major decline. However, international history as a new field has enjoyed widespread attention. Master historians such as Akira Iriye and Michael Hunt have used the international history approach to study US-East Asian relations. William C. Kirby of Harvard University has also emphasized the importance of internationalization, internalization, and externalization in Chinese foreign relations. However, until publication of Xu Guoqi's series of studies from prestigious Western university presses using the international history approach to examine China's major attempts at internationalization, there has been no major breakthrough in the "China-centered" international history of modern China. This essay uses the example of Xu's new book, *Strangers on the Western Front: Chinese Workers in the Great War*, to analyze the key features of Xu's international history studies and their major contributions to the field. I pay special

attention to Xu's skillful use of the new approach and of multi-archival research to present a fresh understanding of the impact of the Great War on China and China's contribution to the Great War through the perspective of Chinese laborers in France during the war.

Keywords: international history, China and the First World War, Chinese laborers